



另一种朝圣

——读《遥远的房屋》

□秦莉萍

一直希望有这样一个庭院:屋前有池塘,塘边有篱笆,篱笆上爬满丝瓜花。夏日,坐于休闲木椅上,茶几上一杯茉莉花茶,翻看一本书,或盯着一朵盛开的丝瓜花,在丝瓜花下看一群群鱼儿追逐嬉戏。

看似简单朴实的一个场景,似乎遥远,却很难有那样清闲的时刻。

《遥远的房屋》的作者,亨利·贝斯顿做到了。其实是一个无意之举。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濒临大西洋靠近科德角的那片海滩买下一块地,并自己设计草图,请人在临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简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里住上一两周,并无意将它作为长久的居所。可是,当两周结束后,贝斯顿却迟迟不愿离去。他突然迷恋上了这所建在海滩上的房屋。大海的潮起潮落,涌向海滩的层层波涛,纷至沓来的各种鸟类,海上的过客,冬季的风暴,秋季的壮观,春季的神圣,夏季的繁茂,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贝斯顿的一个无意之举,让这座遥远的房屋一举成名。

没有人不喜欢浪漫。即便在贫苦的环境,心中依然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贝斯顿建在大海滩上的房屋,孤零零的,虽然简陋,但不失浪漫色彩。房屋的结构可以自己设计,屋内的装饰更可以为所欲为:壁板及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典型水手舱的颜色,贝斯顿称它为“水手舱”。因为房子建在延伸进海洋的沙丘上,恰似漂在海上的一叶小舟,一间遥远的、给人以幻觉的小房子。让人奇怪的是,贝斯顿的房子,最大间居然有七扇窗。本来,一座建在大海滩上孤零零的房屋已经够引人注目了,其中一间有七扇窗的房间,更让人遐想联翩,想一探究竟。住在近似户外的居所,贝斯顿感受着常人无法感受的感受:他靠在枕头上,阳光涌进屋内,大海涌向房门,观望海上升起的繁星,停泊渔船摇曳的灯光,溢出的白色浪花。贝斯顿听着悠长的浪涛声在宁静的沙丘回荡,心神摇曳。

仅此而已。那是一种流光四射的情景,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光的把戏。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梭罗去瓦尔登湖时,带了一支笛子,而贝斯顿去科德海角的大海滩,带的是六角形手风琴。无论何时何地,兴趣爱好不能丢。试想,贝斯顿站在窗边,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水,浪潮一浪赶一浪,手风琴悠悠响着,或许,海浪声掩盖了风琴声,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贝斯顿身心轻松,心境愉悦。

住在大海滩上的小屋,常人一定想,永无停歇的海浪声一定是轰鸣的,咆哮的,汹涌澎湃的,贝斯顿如何能安稳入睡?

他却习以为常。贝斯顿乐意享受这种“吵闹”。有时,坐在摇椅上,闭上他“所有的眼睛”倾听;有时,每逢屋外雷电交加时,他将一盏灯放在窗边,用火慢慢地煮一壶咖啡,翻看一本书,有时干脆望着窗外发呆。

心境如水,无波澜,心才能静。正因为心境平静,贝斯顿才能写出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

他写涛声:“听听那海浪,倾心地去听,你便会听到千奇百怪的声音:低沉的轰鸣,深沉的咆哮,汹涌澎湃之声,沸腾洋溢之声,哗啦的响声,低低的沉吟……”浪涛声在他听来,时而猛烈若急雨,时而轻若私语,时而狂怒,时而沉重,时而庄严的慢板,时而是简单的小调。浪涛声被他听出多节奏的韵律。这韵律就是宇宙之声,是自然之声。

他写日落黄昏:“夕阳像一团火渐渐落下;潮水涌上了海滩,翻卷着深红色的泡沫;远处,一艘货船从浅滩上缓缓驶出,漂向北方”。

他写寂寥的秋末:“十月中旬,陆地的鸟儿都离去了,还有鸡雀留在湿地。李树叶都掉光了。漫步于海滩,我从变幻莫测的云朵中解读到冬季的来临”。

淡然,笃定。

在贝斯顿的笔下,大自然的冷酷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我们如身在画中游。他在旷野中度过的一年,在旁人看来无聊至极的大海滩,但贝斯顿却认为这是一项盛大的典礼,是一场无可比拟的自然的盛会。

据说,那所遥远的房屋在三十多年前的一场风暴中早已葬身大海。贝斯顿书中描写的那片濒临大西洋海滩之所见,已让读者梦见无数次。如果是现在,那座遥远的房屋一定成了网红打卡点,而那间最大的有七扇窗的房间一定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贝斯顿在大海滩上生活一年,他的这一种朝圣,让他的创作生涯达到了人生巅峰。



穆老晚年的一份文稿

——《(南通惨案)补遗》简介

□钱炜

南通文化老人、文史专家穆炬1959年撰写出版的《南通惨案》是第一部忠实而全面记录南通“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的专著,至今仍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场民主革命运动不可缺的史书。《南通惨案》的资料来源除了个人回忆和报刊、书籍外,还查阅了公安部门藏档案,包括已被处刑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杀害烈士的凶手供词。此外,还采访了多位参加斗争的亲历者,以及其他亲历的见证人,所反映的史实来之不易。然而,鉴于当年该书定位通俗读本、字数限制等原因,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纪实被出版社编辑删节或缩写。穆老深感可惜,晚年一直想作弥补,终于花费近三个月时光,于2017年8月22日上午完成了原稿和成书的核对工作,写就了《(南通惨案)补遗》一文。

那一年夏季特别热,那一年穆老93岁。

关于历史背景:

“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南通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徐惊百、钱素凡、邹强、孙卜菁等组织义勇宣传队”“新四军进入了南通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大生一厂工人斗争”。

关于组织领导:

“优秀的共产党员”“出色的地下工作者”“马世和同志”“徐惊百同志”300余字的介绍。

“文艺晚会的节目,有歌咏、朗诵、话剧对白、自由发言等”,“歌曲作者,有钱素凡、顾迅逸、钱健吾、陶应衍等人”,“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成了向敌人斗争的方式和武器”。钱健吾所作的《来! 参加文艺晚会》这一支热情洋溢的歌,鲜明地道出了当时文艺活动的政治内容和进步性质。

“这时,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相当高涨了。城工委考虑到群众的斗争情绪,也估计到敌人必然会来一套伪造民意的活动,经过研究,决定采取防御攻势,先发制人,支持群众的要求,领导这个请愿斗争。但当时的领导意图,还只是以攻为守,是为了瓦解敌人伪造民意的阴谋活动。而后来斗争形势发展了,群众斗争情绪非常激昂,一发而不可止,就使这个请愿斗争发展为一次强烈的政治示威。”

关于1946年3月18日的斗争场景:

“许多老百姓站在队伍的对面,他们感动地倾听着青年们的歌声,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青年们,奉命来监视的军警,也听得如醉如痴”;“军统特务蒋英、袁奎年,中统特务陆鹏程、唐渝、周善若、巫若良,三青骨干分子邵更世等都去了,一共有十几个”;“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国民党当局又扮演了另一幕丑剧。他们组织了五六个人,披麻戴孝,自称是海门灵甸港之役被俘被杀的启东县政府、保安队员的家属,向执行小组‘请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第二天反动报纸上也

登出了新闻,说是‘各家属哭声震天,跪地不起,情况至为凄惨’真是丑态百出”;徐惊百“在病床上听到了并且亲眼看到了国民党伪造民意的卑鄙行为,就以‘里闻’的署名写了这篇文章,给人带到会上去,以此来揭露国民党的丑恶面目”。

关于南通惨案烈士:

顾迅逸“实际上,他当时已成为一个群众领袖了”;郑英年“在他哥哥开设的无线电科行中做职员”。

“唐绍曾、蒋英、刘乃生在墙外监视住,王志德、吴乐山在大门内监视住,其他特务直奔孙平天的房间。这时孙平天正在房间里,还没走。袁奎年拿起手枪对准住他,张玉奇和周濂抓住了他的两只手臂,华裕坤就拿起了一根粗草绳(仓库里到处都是绳子),从后边套上了他的颈项。套上之后,张玉奇在右手,周濂在左手,华裕坤在后面,三个人一齐动手,把孙平天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尸体用棉被和毯子包扎起来,然后离开。后来顾思明和唐绍曾怕包扎得不好,又派张玉奇、周濂、吴乐山和蒋英去检查了一下,并且把房门锁好。他们又派张玉奇和刘乃生到仓库附近检查有无情况。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顾思明派张玉奇和吴乐山到仓库里把尸体抬出来,放在中公园前面桥旁的碉堡里,再从那里运走,丢下江去。”

“四月四日黎明前,三时许,钱素凡又被绑架去了。对钱素凡的逮捕,是由三青分子提供线索并作向导的。两个三青分子(其中一个是通中的学生,一个是县中的学生)带领着军统特务张玉奇、王志德、华裕坤、蒋英、刘乃生、吴乐山、袁奎年等七人,再加上一〇五师谍报队的一个班,由谍报队一个姓张的排长率领,去干这罪恶的勾当。”

“他们第一次在十一点钟时到了南通中学门前,但校门已上锁,不得入内。一直等到后半夜两点钟,他们第二次再去。这次,他们采取了爬墙的办法,张玉奇站在校门东边的围墙下,蒋英从张玉奇的肩膀上爬上去,打破了花墙,然后跳进墙去,破坏了校门上的锁,打开了校门。住在靠校门的西边屋内的校工黄三被喊了出来。特务问他要大门的钥匙,他回答说钥匙被庶务处拿去了。但特务在手电筒光下看到钥匙在桌上,就打了他两记耳光。这时,大门已打开了。特务就把黄三拖到外边,叫他跪下来,不准动。接着,这伙特务由三青分子作向导,进入前楼(教师宿舍)去捉人。三青分子是钱素凡所认得的,其中还有他的学生,所以,他们脸上都蒙了毛巾。黄三也被带了进去。到了东楼梯脚下,特务拍了拍他肩膀,警告地说:‘站在这里不准动!’”

“特务们登上了前楼,一脚闯进钱素凡的寝室。钱素凡勇敢地作了挣扎,高喊:‘有强盗!’‘冤枉!’特务就用毛巾把他的嘴裹住。”

“当夜3点多钟,汽艇开到唐闸,天明时,开到天生港,然后开入江中。当汽艇离开北岸已有多余里时,张排长就下令动手,把他们四个人衣服剥光,用绳子捆绑起来,并用刺刀戳破了他们的胸腹部,然后丢入江中。特务接受了上次孙平天尸体被发现的教训(孙平天尸体发现后,唐绍曾曾责备部下,怪他们做得不干净),这次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把钱素凡等四人的胸腹部戳破,这样,尸体就不会膨胀而浮出水面了。”

“第二天,4月5日,青艺社员罗镇和也被捕了。罗镇和是一个没有职业的青年,家里开的砖瓦店。他参加过一些青艺的活动。例如在演戏时,他收门票。三青分子要看白戏,他也敢于拦阳。后来演《夜店》,他也曾在剧中饰四喜子这个角色。当时,他是准备逃到上海的,但在赴天生港途中,就被捕了。”

2023年是“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77周年,是穆老逝世一周年,谨著此文以为长久纪念。

书室·舒适

□彭伟

书房的主角是死书。书室是可移动的书房,主角是活人。无论在卧室,还是上厕所,我都虔读杂书。书在何处,于我何处就是书室。因为日日写作,须要翻书,随看随丢,以至于经年累月,家中处处狼藉一片。厨内厨外、桌上桌下,甚至枕边路畔,无处不在,好比空气:有的一本孤躺,比较稀薄;有成堆成群,比较稠密。其中有些是体裁、语言不同的书籍叠在一起,就像肤色各异的友人聚在一处,静静交流,有何不可?无论读书是少或多,墨香四溢,我满心欢喜,但是满坑满谷的旧书也引来了家人的抗争。母亲大有始皇王莽之气,太太也有黄巢秀才之势,希望“焚书消灾”。她俩还怜家中的两个小儿。家中行走,总要担心采到书籍,又怕绊倒。

保加利亚小说家格·斯塔马托夫在《两种才能》中戏言:“我情愿跟一个活得快乐的傻孩子在一块儿,觉得他比欧洲作家们的一切作品都好。”孩子的快乐,要比任何著述都重要。读书也是孩子必不可少的快乐。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的妹妹玛丽·兰姆(Mary·Lamb)写过一首动情的小诗,节译如下:

我见过一位目光热烈的男孩

在书摊上翻开一本书,

读得好像要把书吞下;

摊主瞧见了,

我立即听他向男孩招呼:

“你,先生,你从未买过一本书,

那么一本书你应未看过。”

家中的孩子被书挡道,但又比诗中的男孩幸运,不必为没钱买书担忧。对于自己,有书可读,便会有书可寻。有回远行多日,返家翻书,一册早期版本的《爱眉小札》,不翼而飞。翻箱倒柜,处处寻找一两个小时,就是找不到书。时隔数日,我上厕所,翻起一叠厚厚的厕纸,那册《爱眉小札》滑了出来。此时心中的快乐,就像人晾被子,掉出来一张存折;又像人翻老书,落出来一张钞票——结果是必然的,欢喜倒是意外的。

书室中的一本旧书,多如牛毛,乱如

蓬发,为何不经常理理呢?寒门存书,不比富人。王士贞有一位老仆擅于寻书;余光中有一位下女乐于搬书,奈何我只能心羡他们的好运,况且自己又靠不住。体力上,我不是位Lazy Lady(懒惰的女士),但绝对是个Lazybone(懒骨头)。精神上,从文字工作到业余爱好,我翻书写作,仿佛吃饭喝水,日复一日,从未厌倦。混乱的书室看似无序,其实暗示着自己近来研读撰文的意趣流向。

随手捡起一本书,便有随手的喜悦,随时的回忆。《现代汉语词典》绿面蓝脊,里面留下家父的购书墨迹。见字如面,抚书思人。1948年中华书局初印的《京剧艺术》的扉页写满跋语,记述一段感人至深的书事:旧藏者与女恋人在1949年共同学习此书,一起考取南京大学文学院。后来书没了,两人也别了,但是4年后,男恋人在书肆淘回了原书。书里书外,家人外人,种种回忆,种种美好,剪不断,理不清。让书的欢乐,意外地入藏在书室的每个角落,书室便更加舒适了。

读书的兴趣往往决定书室存书的版本、题材、主题。小时,我读过《龙文鞭影》中故事的“次道藏书”。宋代藏书家宋次道有妙喻:“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于是他家藏书都要精校数遍,人称“宋善本”。我初入书道时,多买商务、中华发行的新书,理由是优秀出版社编印的书籍,质量总要高些。陆续读到钱锺书等人的传记,我深感“五四”以来,名家辈出,于是走南闯北,跑遍京沪苏扬等地书市,全力搜罗旧书。二十多年来,家中存有晚清古籍、民国书报刊、涉华英文旧籍、如皋乡贤旧著若干册。虽然不比宋刊元椠,但也不乏稀见旧书,譬如齐白石老人的第一本画册、冒广生先生的批校本、1947年英文版沈从文《大地》等等。参观书房的友人望着满满当当的书籍,喜欢问我,这些书你都读了吗?这好比问种田的农民:你能吃下你种出来的全部粮食吗?答案不言而喻。

于我而言,书太多,读太少。酒徒喝得“枕糟藉腐犹半醉”,最是欢喜。无独有偶,书徒也喜欢躺着看书。欧阳修珍惜枕上时

住。这时,学生已被惊动了。于是,一个三青分子站在学生宿舍前的天水池旁,高喊:“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接着他们就把钱素凡带走,也解到谍报队去。在路上,钱素凡还大喊:“你们是强盗!”结果,被吴乐山打了几拳头。”

“钱素凡其时三十五岁。他是南通中学的教师,并为《人民日报》编辑副刊《苏北文艺》。他在文艺和学术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在学生和青年中有较高的威信。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写过好多宣传和平民主的文章。在文艺晚会上,他是活跃的人物之一。文协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在3月18日,他参加了青年的队伍,在大码头的文艺晚会上,还热情地朗诵了一首诗。敌人早就对他注意,并警告过他,他总以为敌人不会对他下手的,因此不愿离开南通,结果终于被害了。”

“季天择、戴西青、钱素凡、罗镇和四个人被捕之后,都关在谍报队。敌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刑讯,坐老虎凳、灌冷水、用电刑等。钱素凡坚强不屈,痛骂敌人。特务华裕坤骗他说:‘你不要急,有机会就放你出去,我也是新四军。’钱素凡当时就大喊:‘他也是——’于是华裕坤打了他一顿。残酷的刑讯逼不出钱素凡的口供,他仍是骂不绝口。疯狂的特务,竟用刺刀割去了他的一只耳朵。”

“4月5日夜里,敌人对这四个人下了毒手。夜里11点多钟的时候,四个人被从谍报队后楼上带出来。这次充当刽子手的主要是特务连的一个班,仍然是由那个姓张的排长负责;军统方面,派了王志德和张玉奇去协助。他们在商校西边城河边,把钱等四人押上了一〇五师师部的一只汽艇,关在船舱里。说来真可恨,这只汽艇的两个驾驶人员,竟是国民党收容下来的日本兵。”

“当夜3点多钟,汽艇开到唐闸,天明时,开到天生港,然后开入江中。当汽艇离开北岸已有多余里时,张排长就下令动手,把他们四个人衣服剥光,用绳子捆绑起来,并用刺刀戳破了他们的胸腹部,然后丢入江中。特务接受了上次孙平天尸体被发现的教训(孙平天尸体发现后,唐绍曾曾责备部下,怪他们做得不干净),这次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把钱素凡等四人的胸腹部戳破,这样,尸体就不会膨胀而浮出水面了。”

“第二天,4月5日,青艺社员罗镇和也被捕了。罗镇和是一个没有职业的青年,家里开的砖瓦店。他参加过一些青艺的活动。例如在演戏时,他收门票。三青分子要看白戏,他也敢于拦阳。后来演《夜店》,他也曾在剧中饰四喜子这个角色。当时,他是准备逃到上海的,但在赴天生港途中,就被捕了。”

2023年是“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77周年,是穆老逝世一周年,谨著此文以为长久纪念。



光,刻益自励,写下《醉翁亭记》;清少纳言有慧言妙语,一一记好藏在枕下,成为《枕草子》;梁遇春温习枕边的域外散文,译注了《英国小品文选》。最有趣的是钱玄同,他边躺着阅读《三闲集》《二心集》,边骂着鲁迅的“无聊、无赖、无耻”,真是“三心二意”的高手。饮酒也罢,读书也罢,都须天赋才能出众。我也喜欢床上看书,无奈毫无天赋,自然“枕”不出什么佳构,更谈不上做什么作家梦了!

英国剧作家Sir John Vanbrugh(约翰·范布勒爵士)认定书籍是“The forced product of another man's brain”(他人脑中榨出来的作品)。对于天赋不足的人,他的话不无道理。我害怕大脑成为榨汁机,须要痛苦地搅拌。少了白日梦,没了名利梦,于我来说,躺着读书与“躺着中枪”,恰好相反,只有快乐了。读书乐,淘宝乐,都乐在无意有趣间。夜深人静,我惬意地躺在床上,翻阅着轻便的线装本《皋人悼文录》。此